第37卷 第10期　　财经研究　　Vol.37 No.10
2011年10月　　Journal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Oct.2011

经营式农业变迁与传统中国农业经济停滞
——基于人才配置模式的探讨

谢冬水[1]，黄少安[1,2]
(1.中央财经大学 经济学院，北京 100081；2.山东大学 经济研究院，山东 济南 250100)

摘　要：文章在一个简单的人才配置模型中分析了传统中国农业经济的停滞问题。文章认为，经营式农业发展不足是造成传统中国农业经济停滞不前的一个重要原因。经营式农业的发展需要具有企业家才能的经营式农场主的投资和创新，而传统中国社会的制度环境却鼓励人才流向官僚阶层。受官僚阶层高报酬的吸引，具有企业家才能的人大都热衷于进入官僚阶层而无心从事农业经营。这种人才配置模式阻碍了经营式农业的发展，抑制了农业技术创新，农业经济因此陷入停滞状态。

关键词：人才配置；经营式农业；传统中国；制度
中图分类号：F1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952(2011)10-0103-10

一、引　言

中国经济在宋代经历了史无前例的增长，当时的农业技术处于世界最高水平，但是到了明清时期中国农业经济却陷入了停滞状态，农业无论是在技术上还是在制度上都没有实现突破性的发展(林毅夫，2007；艾德荣，2005；珀金斯，1984)。为什么传统中国农业未能实现向上的突破以达到自主的持续增长、迅速的技术创新以及不断提高的生产力水平，这是中国经济史上一个令人困惑的难题。中国经济史研究者对这一问题的解释主要有人口压力理论和阶级剥削理论。人口压力理论认为，传统中国农业经济的停滞主要源于人口增长导致了小农耕作者的广泛贫困、经济剩余的匮乏以及由此带来的引进先进技术动力的缺乏(Elvin，1973；赵冈等，2006)。相比之下，阶级剥削理论则认为，传统中国农业生产了大量剩余，但是剩余却被统治阶级所控制，统治阶级

收稿日期：2011-07-28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71003115)
作者简介：谢冬水(1980－)，男，湖南耒阳人，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
黄少安(1962－)，男，湖南洞口人，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与农业生产保持距离,对于榨取的剩余他们只用于奢侈性消费,而不用于生产性投资,经济因此陷于停滞(Lippit,1987)。

本文主要关注经营式农业的发展。经营式农场主直接参与生产,因此他们不同于与农业生产保持距离的统治阶级;他们控有剩余,因而也不同于一般的贫困化小农。分析经营式农业为什么没有发展,可以具体解释传统中国农业经济停滞的原因。基于这个认识,本文结合传统中国的社会制度环境,试图从人才配置的视角对传统中国农业经济停滞不前的原因作出解读。

二、文献回顾

经营式农业的发展离不开具有企业家才能的经营式农场主的管理和创新,因此只要有足够多的具有企业家才能的人能投入到经营式农业,则经营式农业就有进行技术革新和生产性投资、进而推动农业经济发展的可能(黄宗智,2000)。关于企业家才能配置对社会发展的作用及对中国传统农业停滞的影响已有不少研究文献。

(一)企业家才能配置的文献

理论经济学家已经认识到企业家才能在促进创新和经济增长中的重要性。但是企业家才能并非总是对经济增长有益。这是因为企业家是一些运用其才能和创造性的方法追求个人财富、权力和声望的人,不能期望他们在实现目标时都会关心其行为是否对社会有利,甚至有些行为对社会有害他们可能也不在乎(Baumol,1990)。Baumol(1990)在一篇开创性的论文中指出,企业家才能可以是生产性的(如创新活动),也可能是非生产性的(如寻租),甚至是破坏性的(如犯罪)。企业家究竟是选择从事生产性创新活动还是非生产性寻租活动,主要受不同活动相对报酬的影响,而经济活动的报酬结构则由社会制度决定。因此,社会制度如何对企业家才能的投向进行引导与社会是否具有长期的繁荣之间存在显著相关性。

Murphy 等(1991)就人才配置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做了理论和实证研究。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人才配置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意义,当企业家从事生产性创新活动时,他们会改进生产性部门的技术,带来生产率的提高和社会财富的增多;而当企业家投身于非生产性寻租活动时,他们的个人收益主要来源于对他人财富的攫取,而不是新财富的创造,从而会妨碍创新、技术进步并减少财富创造。如果一个社会的制度鼓励企业家通过生产性活动获得丰厚的报酬,则企业家会流向生产性部门,这个社会就有望兴盛繁荣;而一个企业家大量涌向非生产性部门的社会则可能会陷入停滞或衰退。Murphy 等(1993)还强调了非生产性寻租活动具有规模报酬递增的性质。也就是说,相对于生产性活动而言,随着更多的人才流向寻租部门,寻租会自我强化,寻租的吸引力会增强,而生产性活动的吸引力会下降。

许多研究者通过构建理论模型对 Baumol(1990)的理论进行了说明和扩展(Acemoglu,1995;Mehlum 等,2003)。这些理论模型强调了由制度决定的报酬结构的历史依赖性。

总之,企业家才能配置理论为我们探讨长期经济增长和解释不同国家之间经济绩效差异提供了新的视角。本文尝试应用这一理论对传统中国农业经济停滞作一个合乎逻辑的解释。

(二)经济史的文献

传统中国农业经济停滞问题已经引发了很多解释,其中颇为流行的观点是"高水平均衡陷阱"假说。这个假说最早由 Elvin(1973)提出,他认为传统中国由于人口大幅膨胀侵蚀了维持生存所需以外的剩余,农业剩余的缺乏抑制了农业资本积累和投资,致使中国农业陷入一个落后的"高水平均衡陷阱"之中。赵冈和陈钟毅(2006)在 Elvin 的基础上,进一步从人口增长与技术创新需求的关系上说明人口压力抑制了小农耕作者对引进节约劳动的技术创新的需求。他们认为,在人口与日俱增的压力下,小农耕作者日益被迫采用劳动密集型的生产技术以吸收大量过剩人口得以维持生存,而不是进行可节约劳动力的技术创新。在土地数量不变的条件下,人口压力的确会妨碍人们对节约劳动型技术创新的需求,但是这一理论不能解释为什么在人口压力下人们不进行适应人口过剩的使用劳动型技术创新。此外,这一理论也忽略了经济剩余的分配问题。Lippit(1987)从分配理论的视角对传统中国农业经济进行了分析,他认为传统中国农业经济停滞的原因,并非如 Elvin 所说的剩余不足,实际上农业经济有相当多的剩余,只不过是剩余被统治阶级榨取用于奢侈性消费,而没有进行生产性投资。因此,在 Lippit 看来,传统中国农业落后的原因并不是人们对技术革新没有需求,而是因为社会结构和阶级结构阻碍了新技术革新的发展。

Baumol(1990)则从制度环境的视角对这一问题作出了解释,他认为传统中国的社会制度环境给予政府官员最高的报酬和尊贵的地位,这诱使大量有才能的人不惜付出高昂的代价应对科举考试以求进入政府部门供职。结果,最有才能的人便不再从事改进技术的生产性创新活动,经济因此停滞不前。林毅夫(2007)在探讨为什么工业革命没有发源在中国时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

与上述文献不同的是,本文是在人才配置理论框架下从经营式农业发展的视角来探讨这一问题。经营式农场主控有可能用于创新性投资的经济剩余并且直接参与生产,他们为什么没有做出创新性投资是探讨传统中国农业经济停滞的关键。黄宗智(2000)从社会制度环境的角度研究了传统中国农业经济的停滞问题,他发现一个只能循农业以外的途径晋升上层社会的社会政治体系降低了最有才能的人从事经营式农业的动力,从而妨碍了经营式农业的扩展,经济因此陷入停滞状态。本文所持的理论观点与黄宗智的分析类似,不

过黄宗智(2000)的研究更注重史料分析,本文则侧重于从理论的角度进行分析。

三、人才配置与传统中国农业经济停滞:机理与历史证据

经营式农业具有企业经营的性质,它是一种使用雇佣劳动和追求利润最大化并通过组合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进行生产的农业经营方式。与小农家庭式农业相比,经营式农业拥有较大的经营规模、更多的资本投入与更高的技术水平。世界农业发展的经验表明,经营式农业对小农农业的取代是推动农业技术革新和经济突破的原动力(李丹,2009)。早在秦汉时期经营式农业雏形就存在于中国农业生产中,两汉文献有很多关于经营式农业的记载。例如,《汉书·匡衡传》说:“家世农夫,至衡好学,家贫,佣作以供资用”,①《后汉书·孟尝传》记载:“隐居穷泽,身自耕佣。”②至汉以降经营式农业一直延续,到宋代发展至高峰。宋代许多无产之客户常为经营式农场主充当雇农。如《烛湖集》中有:“侨居黄岩,未习其俗,市田皆得瘠土,公教庸保力耕”,③《夷坚志》中有徐三者:“徐后七年。至秀州魏塘,为方式佣耕”,④《浪语集》中也记载:“大姓以庸客徕招,余三千五百户。”⑤然而到了明清时期,经营式农业却日趋没落,经营式农场主逐渐转化为出租土地的租佃地主,而雇农人数也日渐减少,很多都转化为佃农。有一条史料反映了明嘉靖年间江南地区受雇于经营式农业的雇农的比例“常时为人赁作耐苦而力者,一里或二十名,或二十五名。”⑥明制一里计一百户,假设每户平均五口,有2-2.5个劳动力,则雇农约占当时农村劳动力的10%。顾炎武也说“吴中之民有田者什一,为人佃作者什九”。⑦赵冈和陈钟毅(2006)对晚清山东境内46个县197个自然村经营式农业资料的分析表明,经营式农业所占的土地面积只占地主拥有土地总面积的2%-3%,而受雇于经营式农业的雇农仅占全部农业劳动力的6.9%。到清末民初,除极少数地旷人稀的区域仍有经营式农业外,全国范围内纯粹的经营式农业已近乎绝迹(赵冈等,2006)。由此可见,从明朝至清末,经营式农业是在不断式微。

经营式农业式微与由传统中国社会制度环境决定的人才配置结构密切相关。传统中国的社会政治体系主要由两个既分离又相连的社会系统组成,一个是由农业中耕作者组成的下层社会,另一个是由官僚组成的上层社会(黄宗智,2000)。传统中国社会的制度环境给予官僚阶层极高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报酬,官职是一种巨大的权力和声望,进入官僚阶层不仅是最荣耀的职业,而且几乎是获取巨额财富的唯一途径,当官被人们视作比任何其他职业都要有利可图。据估计,19世纪一个经营式农场主一年的收入大概是200两银子,而一个巡抚除固定收入外,仅额外收入平均一年就可达180 000两,布政使一年的额外收入约为150 000两,道员为75 000两,知府约52 500两,知县是30 000

两(张仲礼,2001)。当然,官僚阶层并不是一个完全封闭、无法企及的系统,国家也为人们提供了一条重要的通往上层社会的途径——科举制度。一个农人只要通过科举考试及第为官,就能改换门庭,获得经营农业所无法得到的报酬。受官僚阶层高报酬的诱惑,整个社会崇尚做官,人们清楚地知道,提升社会地位获取财势的真正途径是进入仕途而不是从事农业经营。有的人甚至为了买官而将土地出卖,[⑧]很明显,他们期望当官的收入会高于经营土地的报酬。

这样的社会制度从两个方面阻碍了经营式农业的发展,一方面,社会中最有才能的人都被吸引去谋求进入仕途,他们一有机会就会放弃农业经营而将土地出租,集中时间和精力用于准备科举考试。这种人力资本的积累危害了经营式农业的发展,因为在企业家总量不变的条件下,用于准备科举考试的人力资本积累并不会生产财富;相反,它会减少用于经营式农业的人力资本的积累。同时科举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浪费了社会资源。明清时期科举考试竞争十分激烈,明朝科举录取率,乡试为 4%,会试在 10%左右(林毅夫,2007),到清朝竞争更加激烈,每次乡试都有将近 200 万人参加,乡试的录取率为 1.7%,会试为 5%,从生员到进士仅有六千分之一的机会(魏斐德,2010)。激烈的竞争使得无数有才能的人将毕生的时间和精力都集中在准备科举考试的知识积累上,无暇顾及农业经营,从而破坏了发展经营式农业所需企业家才能的投入,抑制了经营式农业进一步发展。另一方面,黄宗智(2000)对明清时期华北地区的研究发现,在传统中国的制度环境下,由于官僚阶层的报酬远高于经营式农业的报酬,因此,经营式农场主的农场规模一旦超过 100 至 200 亩,他们就会选择将土地出租,自己转向追求进入官僚阶层以获得更高的报酬,这样经营式农业又重新转化为小农经济。另外,那些因做官而发了财的人又会在农村购买土地并分租给佃农经营,这又减少了可以用于经营式农业的土地。这些购置土地的官僚地主一般都居住在城市,主要在官僚部门从事非生产性寻租活动,他们持有土地的目的不是为了扩大再生产,而是为了储蓄财富和取得声望。他们本来有能力在农业中进行生产投资和技术创新,但是他们却并不关心农业技术创新,而是选择与农业生产保持距离并采取食利阶级的形式从土地所有权中获取收入。据 Lippit(1987)的估计,作为食利阶级,官僚地主通过地租、利息等机制榨取了全部农业产量中的 30%,并将这些剩余用于满足自身的奢侈性消费。由此可见,在一个崇尚做官的社会制度环境中,企业家资源大量涌向官僚阶层,配置到经营式农业中的企业家资源严重不足,阻碍了经营式农业的发展,从而抑制了技术革新和长期经济增长。

四、经营式农业式微与农业经济停滞:一个人才配置模型

我们在 Torvik(2002)和 Mehlum 等(2003)的人才配置基本思想基础上,构造一个人才配置模型对传统中国农业经济停滞作出解释。根据上述史料的

分析,我们假定我国传统农业经济中存在两个生产部门:一个是自给自足的小农家庭式农业部门,具有规模报酬不变特征;另一个是经营式农业部门,具有规模报酬递增特征。该经济生产的产品品种为 M,每种产品要么由一个经营式农场生产,要么由小农家庭式农业部门生产。农业中总的劳动供给固定为 L,劳动力既可以在经营式农业部门就业,也可以在小农家庭式农业部门就业。经济中企业家的总数为 n,$n=n_a+n_b\leqslant M$,其中 n_a 表示配置到经营式农业中企业家的数量,n_b 表示流向官僚机构的企业家数量,$n\leqslant M$ 表明企业家资源是稀缺的。小农家庭式农业部门使用家庭劳动力进行生产,每投入 1 单位劳动力能生产 1 单位产出,边际成本为 1;经营式农业部门以雇佣劳动为基础,每一个经营式农场需要一个企业家和固定单位的劳动力,以 F 表示固定劳动力成本,β 为边际劳动生产率(β>1),每增加 1 单位劳动力有 β 单位的产出,边际成本为 1/β<1。

由于小农家庭式农业部门中存在大量的劳动力且使用规模报酬不变技术,因此小农家庭式农业部门的工资水平以及以小农家庭式农业部门劳动表示的产品供给价格都等于其边际成本为单位 1。经营式农业部门以最低的工资来雇佣劳动力,这个最低工资就是小农家庭式农业部门的工资水平,这样经营式农业部门的劳动力工资水平也为单位 1。对于一个经营式农场来说,它不能将产品的价格定在 1 以上,因为小农家庭式农业部门有众多同类产品的生产者,如果将产品价格定在 1 以上,经营式农场将失去市场份额。当然受利润最大化的驱使,经营式农场也没有必要将产品价格定在 1 以下,所以,经营式农业部门同小农家庭式农业部门的价格水平一致都等于 1。这样,经营式农业部门每生产 1 单位产出就有一个固定的、超过其边际成本的利润率 1-1/β。假设每一种产品的产量都为 y,则社会总产出为 Y=yM。

配置到官僚阶层的企业家的收入主要来源于对经营式农业部门创造财富的再分配。假设经营式农业部门的收入以 $t=\theta n_b/n_a$ 的税率被政府征收用于供养流向官僚阶层的企业家的消费,θ 是一个大于零的外生变量,表示由社会制度所确定的征税技术。官僚阶层除了通过税收将经营式农业的收入转移而获得固定收入(名义收入)外,还通过垄断性服务费用等寻租活动向经营式农业部门获取垄断租金。假设官僚阶层向一个经营式农场榨取的垄断租金为 R,这样一个经营式农场的利润为:

$$\pi_a=\left(1-\frac{1}{\beta}-t\right)y-F-R=\left(1-\frac{1}{\beta}-\theta n_b/n_a\right)y-F-R \tag{1}$$

配置到官僚机构的企业家获得的总收益为:

$$\pi^T=tn_a y+n_a R=\theta n_b y+n_a R \tag{2}$$

为了简化分析,我们假设官僚阶层得到的总收益被平均分配给每一个官员,这样一个企业家投身到官僚阶层能得到的期望收益为:

$$\pi_b=\pi^T/n_b=(\theta n_b y+n_a R)/n_b \tag{3}$$

假设所有的产出都用于消费,因此社会总产出等于经营式农业部门的总利润、官僚阶层的总收益以及劳动力的总工资之和。而所有的劳动力都获得相同的且等于单位1的工资,因此劳动总工资收入为L。这样,在一般均衡条件下,由总产出等于总利润得:

$$Y=yM=n_a\pi_a+\pi^T+L \tag{4}$$

将式(1)和式(2)代入条件式(4)中,解得一个经营式农场的产出y为:

$$y=\frac{\beta(L-n_aF)}{n_a+\beta(M-n_a)} \tag{5}$$

由式(5)可知,当所有的企业家都配置到经营式农业部门时,全部的产品都由经营式农业部门生产,经济将实现现代化。此时,$n_a=n=M$,$y=\beta(L-MF)/M$,社会总产出 $Y=n_a y=\beta(L-MF)$。当企业家全部配置到官僚阶层时,则经营式农业部门因为缺乏企业家而不能出现,整个经济陷入落后的小农经济状态。此时,$y(n_a=0)=L/M$,总产出 $Y=L$,由式(3)可知 $\pi_b=0$。假定所有产品全部由经营式农业部门生产的总产出高于全部由小农家庭式农业部门生产的总产出,即 $\beta(L-MF)>L$。

由以上推导可得,$\partial y/\partial n_a>0$,$\pi_a>0$,$\partial\pi_a/\partial n_a>0$,$\partial\pi_b/\partial n_b<0$。这样,我们的模型表明,在没有企业家配置到官僚阶层的情形下,经营式农场的正利润将推动整个农业走向经营式农业发展道路,从而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

下面我们具体分析人才配置均衡及其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

经济发展中企业家资源是配置到经营式农业部门还是配置到官僚阶层的参与约束条件是 $\pi_a>0$ 和 $\pi_b>0$。在此前提下经济达到均衡的条件是企业家在经营式农业部门和官僚阶层之间的配置,使得从事经营式农业的企业家的利润与配置到官僚阶层的企业家获得的利润相等(内点均衡),即 $\pi_a=\pi_b$;或者从事经营式农业比进入官僚阶层更有利可图,从而没有企业家愿意进入官僚阶层(角点均衡),即 $\pi_a>\pi_b$,且 $n_b=0$。

经济中由于经济报酬结构的不同可能存在多重均衡,均衡点的数目取决于两条利润线 π_a 和 π_b 的相对位置。如图1所示,纵轴表示企业家的利润,横轴表示企业家数量n,从事经营式农业的企业家数量 n_a 从左至右度量,进入官僚阶层的企业家数量 n_b 从右至左度量,利润曲线 π_a 和 π_b 的交点 e_2 和 e_3 满足内点均衡条件,而 e_1 满足角点均衡条件。企业家活动的配置由相对报酬决定,当企业家配置到经营式农业部门获得的报酬高于从事寻租活动的报酬时,企业家会流向经营式农业部门,反之亦然。因此,企业家配置的动态模型为:

$$\pi_a>\pi_b\Rightarrow\dot{n}_a>0,\text{且 }\dot{n}_b<0$$

$$\pi_a<\pi_b\Rightarrow\dot{n}_a<0,\text{且 }\dot{n}_b>0 \tag{6}$$

根据动态配置(6)式可知,在图1中 e_1(发达均衡)和 e_2(低水平均衡)是

稳定状态均衡点，而 e_3 是一个不稳定状态均衡。如果经济初始点在 e_3 的右边，它将收敛到发达均衡 e_1；如果经济初始点在 e_3 的左边，它将收敛到低水平均衡 e_2。由此可知，当社会制度给予经营式农业的报酬越高于寻租活动的报酬，企业家就越会大量流向经营式农业部门，经济就会实现发达均衡（e_1 点）。然而传统中国的制度环境给予企业家进入官僚机构从事寻租活动的报酬远大于从事农业经营的报酬，因此企业家大量涌向官僚部门，经济因此陷入低水平均衡（e_2 点）。由 $\partial y/\partial n_a>0$ 可知，社会总产出 $Y=My$ 是生产性企业家 n_a 的增函数，因此当企业家资源配置处于低水平均衡状态时，由于配置到经营式农业中的企业家资源缺乏，结果导致在此状态下相应的社会总产出远小于处于发达均衡状态时的社会总产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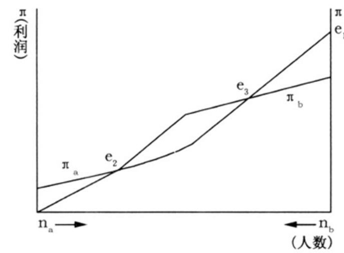

图 1　人才配置均衡

在长期经济发展中，企业家才能配置存在历史依赖性，企业家活动过去的配置以及对未来配置的预期会影响当前的报酬结构（Acemoglu，1995）。因此，一旦一个社会的企业家才能配置落入低水平均衡的初始状态，经济在长期发展中就会收敛到“寻租社会”的低水平均衡陷阱难以自拔。由于社会总产出 $Y=My$ 是生产性企业家数量的增函数，因此根据生产性企业家 n_a 配置的历史依赖性就能描述社会总产出的长期发展路径。图 2 给出了传统中国农业总产出的长期发展路径。由于传统中国社会的人才配置模式处在寻租社会的低水平均衡陷阱中，因此，农业在长期发展中收敛到一个低产出水平 Y_C；相反，如果人才配置处于发达均衡路径上，则农业发展将收敛到一个高产出水平 Y_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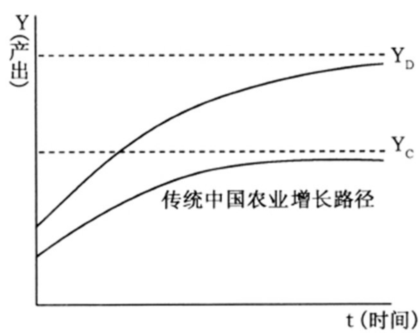

图 2　人才配置与长期经济增长路径

五、结论和启示

我们在一个简单的人才配置模型中讨论了造成传统中国农业经济停滞不前的原因，得出的一个基本结论是传统中国的社会制度给予官僚阶层的经济报酬和社会地位远高于经营农业的，受相对报酬的刺激，社会中最有才能的人没有去从事农业经营的激励，而是竞相涌向官僚阶层以获取最高报酬。一个

人才大量向官僚阶层流动的社会,抑制了经营式农业发展所需企业家才能的投入,经营式农业因此没有发展到具备资本主义企业特征的规模,从而抑制了农业技术和制度双方面的突破性发展,农业经济因此陷于停滞。

从人才配置的视角探讨传统中国农业经济停滞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为我们思考中国农业发展的现状和如何才能尽快实现农业现代化提供了启示。目前我国农业生产总体上仍是一种小农经济的经营方式,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迅速发展,农业比较利益低、农业劳动机会成本高,留在农业中的劳动力主要是一些知识水平低、经营能力弱和创新精神不足的传统农民,而实现农业现代化需要一批能够在土地上熟练使用先进技术、面对市场环境变化能及时调整投入和产出以及具有较高文化水平和经营能力的农民企业家。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深入发展,农业劳动力非农就业将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未来是否会有足够多的懂技术、善经营的农民企业家配置到农业中去,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国家如何采取政策措施以激励和引导具有经营能力和经营积极性的人才配置到农业中去,将是中国农业能否顺利实现现代化的一个关键。

注释:

①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

②范晔:《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版。

③转引自赵冈、陈钟毅:《中国经济制度史论》,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225页。

④洪迈:《夷坚志》,中华书局1981年版。

⑤薛季宣:《浪语集》,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本1986年版。

⑥薛尚质:《常熟水论》,齐鲁书社影印本1997年版。

⑦顾炎武:《日知录》卷十,《苏松二府田赋之重》,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1985年版。

⑧张仲礼列举了一些为了买官而卖地的实例,其中代表性的一例是贵州凯州朱庆奎在1859年卖掉父亲留下的几百亩地以谋取官职。具体参见张仲礼:《中国绅士的收入》,费成康,王寅通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版,第27—30页。

参考文献:

[1]艾德荣.职权结构、产权和经济停滞:中国的案例[J].经济学(季刊),2005,(2):541—562.

[2]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M].北京:中华书局,2000:185—192.

[3]李丹.理解农民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的案例研究[M].(张天虹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113—141.

[4]林毅夫.李约瑟之谜、韦伯疑问和中国的奇迹——自宋以来的长期经济发展[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4):5—22.

[5]珀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年)[M].(宋海文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117—131.

[6]魏斐德.中华帝制的衰落[M].(邓军译)合肥:黄山书社,2010:24—25.

[7]赵冈,陈钟毅.中国土地制度史[M].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315—325.

[8]Acemoglu Daron. Reward structures and the allocation of talent[J].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1995, 39: 17—33.

[9]Baumol W. Entrepreneurship: Productive, unproductive, and destructive[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0, 98(5): 893—921.

[10]Elvin M. 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M].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3:203—319.

[11]Lippit V D.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China[M]. Armonk, New York: Sharpe, 1987: 80—99.

[12]Mehlum H, Moene K, Torvik R. Predator or prey? Parasitic enterprises in economic development[J].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2003, 47: 275—294.

[13]Murphy K, Shleifer A, Vishny R. The allocation of talent: Implication for growth[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1, 106(2): 503—530.

[14]Murphy K, Shleifer A, Vishny R. Why is rent-seeking so costly to growth?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3, 83(2): 409—414.

[15]Torvik R. Natural resources, rent seeking and welfare[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02, 67: 455—470.

The Changes of Management Agriculture and Agricultural Stagnation in Traditional China: Discussion Based on Allocation Model of Talent

XIE Dong-shui[1], HUANG Shao-an[1,2]

(1.*School of Economics, Central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Beijing* 100081, *China*; 2.*The Center for Economic Research, Shan Dong University, Ji'nan* 250100,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ssue of agricultural stagnation in tradition China by a model concerning the allocation of talent. The fall of management agriculture was the main reason for agricultural stagnation in traditional China. The development of management agriculture needed the investment and innovation of management farmers with entrepreneurship, but the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of traditional China encouraged the talent to flow into the bureaucracy. Attracted by high returns, most of persons with entrepreneurship were interested in flowing into the bureaucracy and paid little attention to engaging in agricultural activities. This talent model prevented the development of management agriculture, and restricte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 agriculture; therefore, the agricultural economy was in a state of stagnation.

Key words: allocation of talent; management agriculture; traditional China; institution

(责任编辑　金　澜)